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Center Research in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首页 中心概况 重大项目 科学研究 学术会议 中心简报 史家史书 学术交流 读史札记 English

阒中肆外，为中国史学做“志”

阒中肆外，为中国史学做“志”

尤学工

瞿林东著《史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是《中华文化通志》“学术典”中的一种。《中华文化通志》以志的体例和旨趣，意欲勾勒中华文化的整体面貌。其中《史学志》则致力于反映作为中华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的面貌、成就与特点。

《史学志》全书九章，分两大部分：第一、二章概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是从纵向上阐明中国史学的简史；第三至第九章是从横向上阐明中国史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三、四、五章是关于史官制度、历史编撰、历史文献和治史方法的论述；六、七、八、九章探讨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和优良传统。全书以纵向为背景，以横向为重点，逐步深入，层次清晰，结构严谨。

《史学志》以史识见长。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及其阶段性特征的把握。作者提出，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下限，中国史学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是先秦、秦汉时期，这是史学从产生到成一家之言之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是古代史学的发展和转折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五代至清代前期，这是古代史学的繁荣和嬗变时期。第四个阶段是清代后期以至于今，这是史学的近代化趋势和走上科学道路时期。”（本书第10页）作者把中国史学的发展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恢宏背景之中来认识，体现了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作者对每一阶段史学的基本特征都作了明确的概括，如“成一家之言”反映了史家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代表了中国史学的成熟程度，作者以成“家”作为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可说贴切而恰当。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多途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的势头在隋唐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成书于此时。史学发展到一定高度就必然会提出总结和创新的要求，所以《史通》和《通典》的出现都是合乎史学发展逻辑的结果。作者所论“转折”既包含了对此前史学的总结，又包含了史学创新的新趋势，承上启下，概括非常准确而容易理解。正是有了前一时期的“发展和转折”，才有两宋迄明史学的繁荣。明清之际和清代前期，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总结、反思、批判成为社会思潮的时代特征，中国史学也受其影响，出现了总结和嬗变的趋势。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史学越来越具有新旧更迭的景象，走向近代的趋势和开辟科学化道路都成了史学的必然选择。作者的概括提纲挈领，体现出了各阶段史学的本质特点、基本趋向及其内在联系，显示出作者对中国史学的深刻认识。

作者的史识不仅体现在对史学的宏观把握上，在具体问题上也多有显示。比如作者注意到，中唐以前，皇朝史是史家关注的重点，通史著述没有大的发展，而中唐以后通史撰述成为一个重要的史学趋势，不仅出现了杜佑《通典》、马总《通历》、韩潭《统载》等一批通史著作，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体裁丰富多样，有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传记体等。“这不仅是唐代史学上的重要成就，也是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之重大意义的成。”（本书第45页）这是作者在对唐代史学和整个中国史学的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发现的史学新趋势。

其次是对中国史学中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发掘、清理和阐释。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区分为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并分别加以发掘和阐释，显示出作者系统清理中国史学之理论遗产的意向。在此之前，白寿彝先生在《谈史学遗产》和《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章中就提出要整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本书作者将白先生的设想付诸实践，并加以发展。1984年，他明确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92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第一次自觉地、有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基本情况，被评论为“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史学理论通史纲要”。1994年，作者的认识又有了新发展，认识到“我们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总结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推进史学理论民族化的发展”。《史学志》是作者发掘和整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新努力。“历史观念”一章中讨论的天人论、古今论、兴亡论、英雄论、时势论、夷夏论等问题，都是中国史学中至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说贯穿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始终，而且现在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能够提炼出这些问题并加以阐释，这不仅需要具备足够的“史学”，而且需要具备高明的史识。对于史学理论的发掘与阐释可以认为是本书的一个重点，作者用两章的篇幅阐释了有关的问题。前一章主要探讨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如书法、采撰、史论、史文等，最值得注意的作者是作者对古代史学理论基本范畴的探讨。“史才”、“史学”、“史识”、

“史德”、“史法”、“史意”，都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之理论认识的凝结，也是他们分析和阐释史学的逻辑工具。有了这些基本范畴，才有可能建立比较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作者从浩瀚的史海中提炼出这些基本的理论范畴，迈出了清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步。这和作者此前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表露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后一章着重于探讨史学批评及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实质上是探讨史学的价值与意义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作者在研究问题时，既注重历史的梳理，又注重理论的阐释，使理论见解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这样得来的理论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事实中抽象出的理论，自然具有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这和作者追求的史学理论民族化目标是相吻合的，可见作者在进行分析时已经有了方法论上的自觉。

再次是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精辟概括。关于中国的史学传统，当代学者多有论说，如陶懋炳从器识、学风、文风三方面论中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施丁将之归结为三：一是把史学看作“名山”事业，二是注重才、学、识和史德修养，三是写出了丰富生动的史籍。本书作者也曾撰文归纳了白寿彝先生论及的七项中国史学传统。在本书中，作者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提炼为“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恢宏的历史视野”、“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一致性”、“史学之求真与经世的双重使命”、“坚守史学的信史原则与功能信念”（本书378-390页）。这些概括不仅突出了各个传统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而且具有鲜明的特点。“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一致性”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提出和解决了一个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而“史学之求真与经世的双重使命”也从更深的层次上阐释了“求真”与“经世”的关系，廓清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模糊认识，使人们对于史学的使命和史家的责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些精彩的概括虽然着墨不多，但读后却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给人许多启迪。

作者不仅对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也在实践着这些优良传统。读《史学志》，我们不能不为作者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深沉关切所感染。其实，作者的关切自有由来。早在“史学危机”不绝于耳的1986年，作者就在全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上极富远见地提出史学如何迎接新世纪的问题。1991年他再次提出“中国史学如何在本世纪的最后10年取得更多的创新，更大的成就？”“如何以积极进取的姿态面向21世纪世界史学发展的前景？”1996年，作者将他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思考撰成了《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一文，提出了“造就出一批能够同世界各国史学家对话的新型的史学家”和“探索造就新型的史学人才模式”的双重任务。这些问题和任务的提出，表现出作者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深沉关切和不断追求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史学志》则是这种自觉的史学意识的新发展。作者认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一则取决于时代提供的条件，一则取决于对以往史学的批判继承。这是一条基本规律。”（本书第8页）可以说，《史学志》就是本着“批判继承”的态度来认识和分析中国史学，并提出“中国史学发展之民族化的要求”的（本书第9页）。诚如作者所说：“中国以往的史学，正是中国现今史学的起点”，“史学只有在批判继承中才能创新，才能发展”（本书第8页）。这正是作者赋予《史学志》的任务之一。

毫无疑问，作者对中国史学健康发展抱有真诚的期望，这一点对于当前史学的发展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一方面是新的“史学无用论”在蔓延，成为推动历史学和历史教育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是学风浮躁，唯物史观面临重大挑战，甚至还存在对史学的庸俗化利用现象。这些都影响着史学的健康发展。面对这种情况，任何有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都不能无动于衷，都不能不对史学的健康发展抱有深深的关切。作者在本书中提出要对中国史学遗产“批判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努力创造符合时代要求、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史学成果。这种深沉的责任感正是中国当代学界所亟需的学术精神。

[关闭窗口]